



ERIC VOEGELIN

Philosopher of History

沃格林

历史哲学家

尤金·韦伯 / 著 成庆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RIC VOEGELIN

Philosopher of History

沃格林

历史哲学家

尤金·韦伯 / 著 成庆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格林:历史哲学家 / 韦伯著,成庆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6

ISBN 978-7-5463-5491-0

I. ①沃… II. ①韦…②成… III. ①沃格林,E. (1901~1985)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0185号

沃格林:历史哲学家

作者: 尤金·韦伯

译者: 成庆

出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品人: 周殿富

策划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宋春 孙祎萌

装帧设计: 林涛 秦巍

开本: 880mm×1240mm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号
邮编:100052

电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址: <http://www.jlpg-bj.com/>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5491-0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 *Eric* 与 *Lissie*

中文版序

这本沃格林思想的研究假如能为中国读者尽到一份引介之力,无疑将会令我感到欣慰。写作本书的缘起,这也是在任何语言环境中首次介绍沃格林思想所会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因为西方世界的读者在把握沃格林所讨论的内容方面,存在两个主要障碍。第一个障碍,这也是所有语言的读者都会遭遇的障碍,是他的思想拥有一个博杂的哲学背景与文献来源,许多读者都要借助他力来对此了解。然而另外一个障碍或许对于熟悉自身哲学传统的中国读者而言,要比西方读者相对容易一些。西方读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沃格林处理问题方式的角度,与西方许多根深蒂固的关于实在与人类存在之基本结构的假设是背道而驰的。但另一方面,中国读者在理解沃格林的思想以及探索这种思想与他们自身历史体验的各种问题的相关性方面,要比西方读者更有优势。

西方读者倾向于以这样一种深刻且具习惯性的心智方式来进行思考,这种心智方式通过特定的思想模式所形成,这些思想模式部分是在古典时代所形成的认识论方面的观念,部分则是在17和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中所形成的。起源自古希腊,并延续至欧洲中世纪的古典思想模式,倾向于将实在(reality)的至高至真形式,看作是静态的。这种认知观是关于事物的知识,“如其所是”,也即是说,它们的静

态本质是不会变化的。例如人们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这一点。柏拉图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真实世界和真实的生活包含有动态的过程,但是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是真实实在的虚幻模仿,他将这一真实实在看作是一个静态本质的领域,即著名的柏拉图式“理念”。真正的知识(柏拉图认为仅仅对于上帝而言才是可能的)将直接把握这些理念,而且它也将因此是完美与确定的。即使亚里士多德相比柏拉图而言,是将伟大的实在归结为我们体验世界里的具体事物中所展现的本质,但是他仍然分享了这一种认知观念(后来尤其中世纪欧洲的追随者概括为“存在原因的确定知识”(cognitio certa per causas)),真正的知识将是确定的,因为它将掌握本质本身。例如,这就是在言词上正确地理解,他为何会说,只有几何才代表“知识”;只有通过几何学,人们才能通过纯粹理念含义的演绎来获得完美的确定性。

这种“启蒙”思想肇始于17世纪的文化运动,它放弃了“本质”的观念,而是维持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真实的知识应该来自于对实在的直接观照——与下列观点相异,即实在被看作是由外部与感官性的对象所组成。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实在持续地被看作是由“是其所是”的“事物”所构成——即使这一实在如今是由物质组成部分所构成,而不是由柏拉图式的本质所构成。另外一个假设则是,真实的知识被局限在这样一些探询的类型上,这以外部、物质自然科学为代表。然而,还有一个甚至是更具决定意义的结果,则是被看作是哲学探索核心议题的这种作为动态过程的人类体验(由柏拉图提出,尽管他也持有古典的理念认识论),逐渐变成只是主观性的议题,这也因此与严肃的探索分道扬镳。

作为人类认知主体与积极的参与者而言,他们身处沃格林所谓的“整体之过程”中——就其主观和客观维度的圆满性而言,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而且我们的语言决定着,至少是预先决定着我们的精神视

域范围之所及。现代的西方听众所适应的语言已经受到这种古典与启蒙认识论的混合形态所影响,并且还受到了自然科学之强势地位的影响。沃格林思想的起点是,具有丰富性的体验复合体,其组成信息不仅仅是感觉上的,还是意识上的,而且不仅要解释前意识,还要解释意识层面,但与这种倾向不同的是,在前述的那种语言类型中,体验已经逐渐只被化约为信息而已,而且通常还只是感觉信息。同样的,这类的存在也会被看作是外部事物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过程,我们能在此过程中与整体存在相遭遇,而且这个过程将会推动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当现代西方读者听到沃格林说,就如我在“体验与语言”一章中所提及的那样,“对于细心的观察者而言,实在……不仅仅是由静态实体所组成,每个都有固定与精确定义的特点,而且还由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所构成”,该过程“是不能根据‘它所是’来精确定义……而是要根据这个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特定趋势与可能性来界定”,并且“那一过程中的实在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即被解释为通往存在之路上的存在(being)”,要把握他所谈论的内容,就要在心智上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更不用说要察觉到为什么这一点对于理解我们的生命实在至关重要的原因所在了。

另一方面,在中国思想里,不管是生长在汉语里的道家哲学还是儒家哲学传统,最根本的实在概念设定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变化,寻找着平衡,并且是奔向人类可能性的圆满之境,就像道家之仙人,佛教的菩萨,或者是儒家的圣人。不管中国读者更多是从道家、佛教,或是儒家来了解这一点,至少对沃格林的下列看法不足为怪,即真理是一个动态过程,意识不断深入的参与到这个实在过程之中。

中国思想的悠久传统相比西方而言,要倾向于一种实用式的、以体验作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也是让沃格林的下列倾向显得有趣与容易接近的某种原因,即他将重点放在对圆满性各个维度的体验方面(这也是当他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端经验主义者”的原因所

在,这个术语借用自威廉·詹姆斯),以及“开放存在”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实际含义方面,和忠于这种超越性的提升力方面,他借此所谓的是我们的深邃感受,即人类生命拥有圆满之可能性——他在自己的例子中指代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成熟之人(*spoudaios*)的实现,但是他或许也会使用汉语的等价术语——儒家圣人。

我希望,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沃格林思想的政治维度是特别有趣以及具有助益的。沃格林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哲学并不是无中生有地以沉思的方式降临到生活之中的,而是对朝向真实秩序之内在提升力,以及对人们在历史性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失序所感受到的紧迫性作出的回应。沃格林本人在其年少与青年早期,遭遇到发生在中欧国家的帝国秩序的突然瓦解,然后紧随其后的希特勒主义又逼迫他在1938年流离至美国,而且在希特勒之后,笼罩在东欧与中欧的斯大林主义也最终崩溃。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试图通过暴力实现乌托邦。中国在帝国秩序瓦解之后的那个世纪中同样也是如此,早期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之后遇到日本入侵,然后就是各种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一种激进地强迫转化人性的乌托邦式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偶然地成为主导。如今的中国,至少对于观察者而言,看上去是奔向一条更为实用主义的道路,而不那么乌托邦化,并且是更为中国式的。因此,对于中国思想家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他们探索着评价自身世界所经历的体验的各条道路,而且去思考前方何去何从,以及在这些道路中可能会出现的人类繁荣。我觉得,并且是深深地希望,读者们会从沃格林的思想之中找到有资于此的借鉴。

序

尽管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之一,但是对其著作所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才刚刚起步。我所期望的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以及比较宗教的学者们对于沃格林的关注将会使得他在公众中赢得更多的读者。正如我将在此简述中所言,许多读者之所以对沃格林畏难而退,有各式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提供一个整体的视野以及澄清沃格林的一些基本概念,去帮助那些潜在的读者去克服理解上的困难。我也希望本书能给予专业内外的人士以同样的助益,使得这位重要人物的思想更容易被从前未有涉及的读者所能接受,甚至使那些曾对沃格林有过研读的读者去理解其思想基础的精妙之处。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理论性的;它将阐明沃格林的哲学原则与概念,并且解释沃格林是如何发展这些原则与概念的,它们将同时与当代的哲学话语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相参照。第二部分会简要的概括沃格林在其理论原则之下研究历史的主要脉络。第三部分将聚焦在沃格林的两个最关切的主题:宗教哲学以及历史哲学。因为沃格林使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这些术语的含义通常离开语境后就难以辨清其含义,或者在不同章节中使用时也难以记忆,我特地在主题索引后附加了词目表。

我也想对许多人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对于本书饶有助益的评论,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姓名。不过这里仍然要列出少数几位,他们的襄助使得本书增色不少:Michael Anderson, Dante Germino, William Havard, Robert B. Heilman, Rodney W. Kilcup, Thomas J. Mcpartland 以及 Donald W. Treadgold。

这里尤其要感谢埃里克·沃格林,是他鼓励我从事这项工作,还在写作过程中阅读了每个阶段的手稿,给予了相关评论,还要感激他在奉献其未刊手稿时所表现出的无尽善意、热情与慷慨。这甚至让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这般有趣的事业和令人欢欣的同道。

当然这并非是说,沃格林教授或者其他我所罗列姓名的人将对本书的阙失处负有任何责任。假如存在相关错谬之处,我衷心期盼未来会有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予以斧正。

1980年7月

西雅图

引 言

伟大哲人的思想永远是一种挑战。无论当代或传统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往往超越了读者的视野,探究这样的哲学家,其实就是探索自己并不熟悉的经验与视域,这一过程常常令人感觉不适,通常还需要在心志与知识方面都作出相应的扩展。当然这正是我们称之为伟大哲学家的原因所在。我们容易给过往的思想家贴上标签,认为时代会证明其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接受了这种历史的判定。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位当代思想家时,我们难免会感到疑虑甚至会小心翼翼,而不大会认为我们判断与思考的习惯模式其实是岌岌可危。

假如这是阅读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唯一困难,那么他似乎并不那么令人生畏。与其他当代的哲学家不同,沃格林会要求读者对已经流行数世纪之久的现代思想视角作彻底的转换。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尽管沃格林声名显赫,但其读者却相对稀少;他的著作通常都拥有着令人生畏的名声。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不仅要求读者在视域上作彻底的转换,而且同样也需要对整个西方思想史相当熟稔——神话学,哲学以及宗教的。他选择铺陈其思想主线的遑遑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如今已经达到四卷的规模,而且尚有一卷有待完成,[1]这也使得他成为令人敬而远之的“丰碑”作者之一。

许多对沃格林有所耳闻的读者也会对其思考方式有着错误的印

[1] 第五卷已经于1987年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注

象。比如,或许是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一个版本,说他是一位政治与宗教上的“右翼”思想家。这样的态度当然是由于沃格林的观点不为人所熟悉;人们会习惯性的将他归入到熟知的模式中。比如,假如注意到他并不是一位教条主义自由派,那么就很难不去假设,他肯定属于教条主义保守派。摩西·哈达斯(Moses Hadas)在《观念史杂志》上评论《秩序与历史》时,甚至暗示沃格林是一位秘密纳粹分子。〔2〕对沃格林的思想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正如丹特·杰米诺(Dante Germino)所言,“作为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反对根据政治斗争的语言而作的各种分类:他既非左派和右派,也不是中间派,他仅仅专注于对政治议题本身进行反思性研究。”〔3〕

威廉·哈瓦德(William Havard)与沃格林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43年,那时他刚进入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读书,而沃格林此时刚刚开始在这里长达16年的执教生涯。他说,“或许衡量美国政治科学家忽略沃格林之努力的真正标志,是下列这一事实,即他虽没被完全忽略,但却用一些分类标签就把他打发了,其中大部分都表明,贴标签者既没尝试去阅读他,就算读过,他们也没有尽力去理解他。”〔4〕哈瓦德讲述了几个关于拒绝理解沃格林的有趣故事:在一个场合下,一位研究生(如今已是一位优秀的专业社会科学家,当时沃格林正谈到哈罗德·拉斯基,“他是时代的弄潮儿。”)听完沃格林对社会民主改革在

〔2〕 19(1958):444.

〔3〕 “Two conception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George W. Carey and George J. Graham, Jr., eds., *The Post - Behavioral Era*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2), p. 248.

〔4〕 William C. Havard, “Voegelin’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Consciousness,” in Stephen A. McKnight, ed., *Eric Voegelin’s Search for Order and History*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

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用性的必要所作的分析后,他评论道,“我不知道沃格林是社会主义者;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反动分子。”在另一个场合,“让我非常震惊的是,一位本人相当尊重的资深教授竟武断地宣称,他不能向沃格林表达敬意,因为‘沃格林自从来到美国后,从没发表过反纳粹的言论。’这让人非常困惑,如此渊博的学者本不应忽略沃格林的下列几篇文章,‘种族观念的兴起’(The Growth of the Race Idea)……‘扩张战略’(Extended Strategy)以及‘德国霸权的几个问题’(Some Problems of the German Hegemony)”〔5〕

对于任何习惯常见哲学解释类型的人而言,沃格林让人难以把握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家。他并不提供一个按照传统名称来贴标签的观念系统——例如“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等等,让人更为不安的是,他甚至不提供一个标准的哲学论证,一般而言,这样的论证过程都是引领着读者利用形式逻辑从前提推导出结论。当然,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独断式的思想家;但回到一个假设上,也就是哲学家的目标必须是呈现一种学说,并为之摇旗呐喊。然而沃格林却对哲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厘清这一不同的理解将是本书首要而且最为关键的任务所在。那将花费一些时间,我将在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就此投入较多的精力,但在这里简要的介绍一下哲学对于沃格林究竟意味着什么——大致描述一下沃格林是何种类型的哲学家——将会对读者有所助益。

〔5〕 Ibid., pp. 12-13. 或许有人会提到这与沃格林早先在德国所发表文章的关联,那些文章直接导致他在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丢掉了维也纳大学杰出教授职位以及之后的逃亡。这些专论包括,*Rasse und Staat*, *Die Rassenidee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von Ray bis Carus*, 它们都出版于1933年, *Der autoritäre* (1936) 以及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1938)。沃格林从盖世太保手中的逃脱过程相当惊心动魄;他们四处搜索沃格林的踪迹,而且在他逃亡那天全天候地监控着他的住所。

着手这一工作,或许最佳方法是描绘出他是如何发展关于哲学任务的本质性概念,以及最终又如何能在20世纪40年代成型为目前这种形式。沃格林作为专长于法律与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家开始其学者生涯。在40年代初,他着手一项可称之为其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计划,去研究古今政治观念史。他稳步推进这一研究计划达数年之久,最终写出数卷规模的手稿,其中部分已经付梓出版。〔6〕然而在1945年,当在研究谢林(Schelling)的神话学与启示论时,他得出一个极为关键的结论,他对过去全部工作基础的理解是错误的。〔7〕这一结论

〔6〕 已出版的最大一部分被收入在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volution*, ed. John H. Hallowell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5)。下列数篇论文也见诸上书,“Siger de Barbant” (1944), “Machiavelli’s Prince: Background and Formation” (1951) 以及 “More’s Utopia” (1951)。除外,还有数目可观的资料尚未出版。另外有大量的手稿,包括从中世纪到17世纪的资料,目前正由 William Havard 整理出版。

〔7〕 沃格林并没有在其出版物中详细提到这段插曲,但是一些评论者对这一转变有简要的叙述。参看 Havard, “Voegelin’s Changing Conception,” pp. 14 - 16, 24, 以及 Hallowell 的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volution* 一书的序言。Havard 与 Hallowell 仅仅将时间点确定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沃格林本人讨论过思想的这次重大进展——主要是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所作的根本突破,他在1943年所写的 *Anamnesis* (Gerhart Niemeyer 译, Notre Dame and Lond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 - 13) 英文本的第一章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中提到了这一转变,但是此时其历史研究的最终方法尚未成型。当我在1977年7月询问沃格林有关他从观念史转变到“体验历史以及符号化”的这一关键认识的确切日期时,他回答说是在1945年,他还记得当时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两月。然而他仍然继续已经着手研究的政治思想史;概念上的最初转变开始于1945年,但他说,转变是到40年代后期才最终完成,因此他也就没有继续早先的研究计划。有关沃格林对于“编纂式观念史”的一个最近的批评,参看 *Anamnesis*, pp. 181 - 182。该书的德文本, *Anamnesis: Zur Theorie de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Munich: Piper, 1966), 与英文本不尽相同,后者收入了一章新内容,来自于他的一篇最近的重要文章——“Reason: The Classic Experience,” 该文发表在 *South-ern Review*, n. s., 10, no. 2 (Winter 1974): 237 - 264, 英文本还省去了德文原版中的7节内容。当有必要参考德文原版时,我将统一使用德文本。

意味着观念并非是思想中最为根本的东西,其自身也没有独立的生命,而只不过是各种不同体验与存在状态的符号化表达。或者说,至少这才是其根源所在;生成这些观念的经验被消除了,因而也就失去了观念的实质,最终成为论证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与对象而已。另言之,常见版本的观念史对于沃格林而言,只不过是一出建立在幻觉上的皮影戏而已,真正的意义不能再通过层层剥茧的方式获取,此时哲学本身也就随之荡然无存。

随着否定过往的认识,沃格林从那时起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花费了数年光阴来发展关于哲学的确定性概念,即通过恢复哲学体验的基础来重新发现哲学追求本身。他于 1951 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沃格林讲座所作的演讲(后来这些演讲发表在《政治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上),〔8〕对他而言,毫无疑问,哲学就其实质来说,并不是一组观念,而是一个有关存在体验作用的阶段——最具意识反思性的,身处其中,人们可以体验和自由地感受沃格林称之为的“存在的紧张感”,灵魂对于真理与生命圆满的深深渴求,以及一心奔向某个目标的哲人灵魂推动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个谜,但是却有着绝对的吸引力。

这是一个涵括了哲学家之整体存在的过程,其中相对无意识的程度与被启明的程度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由此观之,哲学可被称为是一个苦思、质询与追求的连续过程,在此过程中,意识的清晰程度总是不断变动,而且将意识本身表达成许多象征性的符号,观念仅仅是这些

〔8〕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这些演讲原先的题目是“真理与表达”(Truth and Representation),沃格林更为偏好这个题目,因为它与全书主旨比较相符,这一主题在每个社会里都扮演着构成性的角色作用,通过符号化的自我一表达,以及借助这种方式可以与不同层次的真理发生关系,也就是与存在的结构中不同层次的表达发生了关系。

象征符号的一种而已,而且往往并不充分。哲学的概念化表达是哲学生涯中最为粗浅的层次。这种方式的最好结果,应该具备高度的明确性与自我意识,但是高清晰性也会导致原始体验中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丧失,这种原始体验是永远都无法被澄清的存在之谜的根源所在。沃格林所处理的存在,并不是我们沉思的客观对象——仿佛那就像是一块领域,我们可以走进去用单一的观点去理性的把握它们。除非我们的生命能够充分浸润其间,否则存在将永远是一个谜:它既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激情,尽管清晰可见但却仍然奥妙难测。

而结果是,我们存在的各个方面往往总是需要用与神话类似的语言去表现和探究它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神话学以及宗教都有本质上的连续性。这也是为何沃格林在其巨著——《秩序与历史》中要回到起点处——也就是该书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Israel and Revelation*, 1956)里——去处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希伯来文明的神话与宗教思想,这也是他为何会在第二卷《城邦的世界》(*The World of Polis*, 1957)里通过荷马与赫西俄德(Hesiod)〔9〕去研究古希腊思想的原因。同样,第三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Plato and Aristotle*, 1957)的特色在于揭示出柏拉图思想中对神话的强调;或许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其他关于柏拉图的研究将注意力不仅集中在传统与原初神话上——柏拉图将其使用在探索哲学问题的过程里,而且还聚焦在柏拉图对待神话的态度上,他认为,柏拉图将神话本身当作是哲学反思的基本工具。沃格林在第四卷《普世时代》(*The Ecumenic Age*)中继续对该主题进行处理,尤其关涉到基督教,而我们自然也可以预料,他会在第五卷,也就是最终卷——《寻找秩序》(*In Search of Order*)中继续深入这一研究。

〔9〕 古希腊诗人,生活在约公元前8世纪—7世纪,主要作品有《工作与时日》与《神谱》。——译注

对于沃格林来说,哲学家——其天生的使命必然同时是一个哲学思想史家和一个历史哲学家——的知性事业已经成为是对哲学体验根基的恢复,对历史记忆进行不同层面的符号化、神话化以及概念化,直到抵达哲学追问的动力核心所在,这种追问来源于人类对真实存在的心灵探求。

论及历史哲学,当然也就在当下提出了一个所有研究所欲回答的问题:一种充分的历史哲学拥有哪些特色?沃格林对此主题有何特殊贡献?对于初读沃格林的读者而言,这也涉及另外一个容易误解的要点。当平常人听到“历史哲学家”的名号时,他们通常以为“历史哲学家”会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主宰历史的规律,该规律是事件的一种内在原因,而且“历史哲学家”可以凭借这种知识不仅解释过去,还可预测未来。*Eilert Løvborg*,这位易卜生在《海达·盖布乐》(*Hedda Gabler*)中塑造的滑稽角色,是依照像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亨利·托马斯·巴克勒(Henry Thomas Buckle)这些带有少许酒神风格的形象作为原型来设置的。“历史哲学家”在现代的概念根源是维柯(Giambattista Vico),他断言,历史哲学——他的“新科学”,能够比当时领一时之风骚的自然哲学具备更多的确定性。〔10〕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这一标题影射了维柯的工作,而且明显是在攻击它的当代实证主义版本。

沃格林关于历史哲学的概念则大为迥异。事实上,他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并不试图去找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能够借此去解释或预测事件内在的原因。他反而将历史视为人之生命的一种变量,这意味着对于历史主体——人类而言,历史中总是存在着不可化约的自由要素,即同时具有选择的可能性与义务。他的选择到底有多大程度是自觉和理性的,取决于个体对真理与负责任的行为有多少清晰的认知,但

〔10〕 Vico, *The New Science*, trans. T. G. Bergin and M. H. Fisc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8), bk. 1, sec. 3, no. 331.